

《宋史·道學傳》人物從祀孔廟之探析

李蕙如*

提 要

《宋史》別立〈道學傳〉，說明士人不必追求仕祿，或是著力文學經術，自有承繼道統的不朽價值，其中人物從祀孔廟者約佔百分之九，或許因道學家們能為厲世摩鈍之用，更具慨然承擔的氣魄。因此，透過官方力量操作，得以從祀孔廟，此一殊榮也代表後世學者及統治者在儀式及制度上對他們延續道統貢獻之承認。以從祀時代觀之，主要集中在學統四起的宋代與雖是外來政權，但卻崇尚文治的清代，朝廷宣揚孔廟禮儀，使政治與學術力量得以匯合，也可看出從祀雖有崇德報功的原則，但在不同時代仍有其偏重；另以從祀人物來看，北宋五子及朱子的地位確實高於其他道學家，從祀制也使聖學系譜得以建構。

關鍵詞：道學、孔廟、從祀、朱熹

* 現任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104年12月27日；接受刊登日期：105年4月24日。

一、問題緣起

清儒崔述（1740-1816）曾言：

二帝、三王，孔子之事，一也；但聖人所處之時勢不同，則聖人所以治天下亦異。是故，二帝以德治天下，三王以禮治天下，孔子以學治天下。¹

自魯哀公稱頌孔子，追諡為尼父以來，歷代加封，追贈如下諡號：褒成宣尼父、文聖尼父、先師尼父、宣父、文宣王、元聖文宣王、玄聖文宣王、至聖文宣王、大成至聖文宣王、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等²，諡號中有「文」、「宣」、「大成」：「文」即「施而中理曰文」³；「宣」即「施而不私曰宣」⁴；「大成」即「成名公為大」⁵。以學治天下的孔子於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西元前 477 年）逝世，次年，其弟子在其故所居堂立廟祭祀，廟屋三間，內藏衣冠等遺物，並按歲時祭祀，成為世界上第一座孔廟。⁶孔廟又稱孔子廟、夫子廟或文廟，具有祖廟與學廟合一的特徵，為宣傳儒家思想的重要場域。《史記·孔子世家》：「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而後從政。」東漢永平十五年（72），漢明帝東巡路過曲阜，以太牢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此後弟子從祀成為定制。

《宋書》曾記載東晉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尚書謝石上書建議「請興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⁷，孝武帝採納其言，於是「選公卿、二千石弟子為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此處廟屋應為孔子廟、國子學與諸生省，且標誌中國古代廟學制度之源起。⁸貞觀四年（630），唐太宗詔地方州、縣學普設孔廟，使士人感受成聖希賢的榮耀。⁹孟子在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被封為亞聖，元文宗至順二年（1331）顏回、曾子、子思被分別追封為「復聖」、「宗聖」、「述聖」。崇德元年（1636），清廷在盛京為孔子建廟，遣大學士范文程致祭，並

¹ 崔述：《崔東壁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261。

² 參考《闕里廣志》卷3「諡號章服」，頁283-284。

³ 蘇洵：《諡法》卷1，史部，頁899。

⁴ 蘇洵：《諡法》卷1，史部，頁902。

⁵ 袁應兆：《大樂嘉成》，頁284。

⁶ 參考孔祥林等：《世界孔子廟研究》（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頁7。

⁷ 《宋書》卷14〈禮志〉。

⁸ 此處參考高明士說法，詳見氏著：《東亞教育圈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51-53。

⁹ 歐陽脩：《新唐書·禮樂制第五》（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15，頁373。

定每年二八月上丁日行釋奠禮。入關後，又以京師國子監為太學，立文廟。¹⁰截至民國八年（1919）追加顏元、李塋從祀孔廟為止，計有一百七十二人。配享從祀有三個等級：第一級是「四配」，東側是顏回、子思，西側是曾子、孟子；其次，是「十二哲」，計有閔損、冉雍、端木賜、仲由、卜商、有若、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顓孫師、朱熹，四配十二哲人物都在大成殿¹¹；最後則是東西兩廡從祀的「先賢先儒」；除子思、孟子、朱熹外，其餘皆為孔子門人。子思、孟子、朱熹三人對於經典傳承的共通點為不限於前人之說，而善於闡發，且具新意。

子曰：「人能從道，非道弘人」，孔廟從祀者意在「佐其師，衍斯世之道統」¹²，此處的「師」意指孔子，以道自任乃士人信念。清儒錢大昕有言：「孔廟從祀，非尋常事」¹³，可見入祀孔廟之殊榮。黃進興〈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¹⁴一文，從文化的角度，探討儒學主流思想如何透過道統意識來左右孔廟從祀制，並造成歷史上的諸多變遷。黃進興曾從思想及制度兩方面考證孔廟祭祀過程中官方勢力滲透的過程，指出孔廟祭祀有別於一般民間信仰，自唐初以來即已發展為國之大祭，故官方色彩鮮明。孔廟廣布乃為奉行朝廷教化政策，進而達到社會凝聚之目的。孔廟代表的雖是相對於「治統」的「道統」，然因儒教對統治者而言是一種極其有利的教化方式，因此由孔廟所代表的道統經常被官方制度化，發起者亦來自朝廷。由於孔廟在祭祀上的官方色彩，因此能否入廟配享，便成為儒生與地方官宦所重視的大事，因此，孔廟祭祀以「從祀制」為其特徵。¹⁵而且，孔廟從祀制對儒學的推動、孔子學說的維揚、倫理道德的建立，確實有其意義與價值。¹⁶本文以《宋史·道學傳》人物為討論對象，試圖從孔廟配享從祀，探尋道統傳承。

二、共時性：從祀人物

「孔子有功萬世，宜饗萬世之祀；諸儒有功孔子，宜從孔子之祀」¹⁷，然而，

¹⁰ 郭松義、李新達、李尚英：《清朝典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頁160。

¹¹ 大成殿始建於唐代，因孔子曾被封為文宣公，故又稱文宣王殿。宋崇寧三年（1104）徽宗趙佶取《孟子》的「孔子之謂集大成」語義，下詔更名為大成殿。現存大成殿為清雍正二年（1724）重建。殿外正中匾額是清雍正皇帝所題的「生民未有」，殿內正中是康熙皇帝所題的「萬世師表」和光緒皇帝「斯文在茲」，南面則有乾隆皇帝題書的「時中立極」的匾額。見韓秀林編：《孔府孔廟孔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頁78-80。

¹² 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臺北：偉文圖書公司，1976年），卷115，頁2。

¹³ 錢大昕：《潛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19，頁322。

¹⁴ 黃進興：《優入聖域》（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頁218-299。

¹⁵ 黃進興：《優入聖域》（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頁164-222。

¹⁶ 相關資料可見高明士：《中國中古的教育與學禮》（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年）。

¹⁷ 黃彰健校：《明神宗實錄》卷155，頁4。

後儒如何有功於孔子？或許可從明儒程敏政之言得到解答：「諸儒從祀於孔門者，非有功於斯道不可。然道非後學所易知也，要必取證於大儒之說，斯可以合人心之公」¹⁸易言之，道本非易知，需經歷代儒者闡釋發揚，方能為後人所理解。再者，孔子為儒者所尊，為道統之源。職是，孔廟的設立，乃將抽象的道統寄於聖賢，化為有形的表徵，可見統治者尊崇的不僅是孔子本人，更是孔子所代表的道統，正如宋末元初的熊鈇（1247-1312）明言：「尊道有祠，為道統設也。」¹⁹而以道為名的《宋史·道學傳》人物中，從祀孔廟者計有十五人，以下據《文廟祀典考》及《優入聖域》附錄：孔子從祀表²⁰，臚列於下：

（一）十二哲：朱熹

朱熹，名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宋建炎四年生，慶元六年卒。年七十一，於宋淳祐元年（1241）入祀孔廟，然而陸象山卻遲至明嘉靖九年（1530），因陽明門人薛侃之請才得以從祀孔廟²¹，其間差距三百年之久。陳建（1497-1567）盛讚朱熹為儒學振衰起弊：

有帝王之統，有聖賢之統。如漢祖、唐宗、宋祖開基立業，削平群雄，混一四海，以上繼唐、虞、夏、殷、周之傳，此帝王之統也。孟子、朱子距異端、息邪說、闢雜學、正人心，以上承周公、孔子、顏、曾、子思之傳，此聖賢之統也。²²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漢唐諸儒上，在在顯示朱熹地位。

（二）先賢：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

周敦頤、程顥、程頤，均於宋淳祐元年（1241）入祀；邵雍於宋咸淳三年（1267）入祀；張載，於清雍正二年（1724）入祀。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宋天禧元年生，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諡曰元。世稱濂溪先生。

程顥，字伯淳，河南洛陽人。宋明道元年生，元豐八年卒，年五十四。諡曰純。世稱明道先生。元至順元年封豫國公。

程頤，字正叔，明道之弟。宋明道二年生，大觀元年卒，年七十五。諡曰正，世稱伊川先生。元至順元年封洛國公。

邵雍，字堯夫，河南洛陽人。宋大中祥符四年生，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

¹⁸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10，頁12-13。

¹⁹ 熊鈇：《熊勿軒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卷4，頁48。

²⁰ 該表（頁303-311）參考牛樹海《文獻通考》（同治十一年）、孫樹義《文廟續通考》（1934）、駱承烈、郭克煜《孔子故里勝迹》（山東：齊魯書社，1990年），頁94-101。

²¹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50，頁1300。

²² 陳建：《學部通辯》（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終編〉，頁9。

諡曰康節。

張載，字子厚，大梁人。宋天禧四年生，熙寧十年卒。年五十八。諡曰明，世稱橫渠先生。

其中，張載雖入祀時間晚於二程，然位次卻於二程之上，其因有二：一因為二程父表弟，此外，因年亦長於二程故也。然而，邵雍雖年長於四子，位次卻列四子之下，則可知位次之序除與序齒相關外，在道學上的地位及道德亦為考慮要素。²³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諭大學士等曰：「先賢、先儒從祀位次，應視其道德為先後，不可援師弟為定例。」²⁴是故，從祀主要是從學問淵源和人品操守觀之，或由學術造詣而定。又，周敦頤、張載、二程、邵雍均於崇禎十五年從先儒改稱先賢，可看出理學地位之躍進。

（三）先儒：張栻、楊時、李侗、羅從彥、謝良佐、尹焞、黃榦、

陳淳、游酢

張栻，於宋景定二年（1261）入祀；楊時，於明弘治八年（1495）入祀；李侗、羅從彥，於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入祀；謝良佐，於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入祀；尹焞、黃榦、陳淳，於清雍正二年（1724）入祀；游酢，於清光緒十八年（1892）入祀。

張栻，字敬夫，漢州綿竹人。宋紹興三年生，淳熙七年卒。年四十八。諡曰宣。世稱南軒先生。景定二年從祀，封華陽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

楊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宋皇祐五年生，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諡曰文靖。世稱龜山先生。

李侗，字願中，延平人，宋元祐八年生，隆興元年卒，年七十一。諡曰文靖，世稱延平先生。《文廟從祀位次考》²⁵指明萬曆四十二年從祀稱先儒。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州羅源人。宋熙寧五年生，紹興五年卒。年六十四。諡曰文質，世稱豫章先生，《文廟從祀位次考》²⁶指明萬曆四十二年從祀稱先儒。

謝良佐，宋皇祐二年生，崇寧二年卒，年五十四。道光二十九年時，河南巡撫潘鐸請以從祀²⁷，列楊時之次，從祀稱先儒。

尹焞，字彥明，洛人。宋熙寧四年生，紹興十二年卒，年七十二。賜號和靖處士。

²³ 「五子之中，邵子年最長，而列四子之下者，則於序齒之中，兼論道德也。」見《文廟祀典考》卷首，頁55。

²⁴ 龐鍾璐：《文廟祀典考》（中國禮樂學會，1977年），卷1，頁4。

²⁵ 〔清〕陳錦，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編輯：《文廟從祀位次考》（山東：山東友誼書社），頁1196。

²⁶ 〔清〕陳錦，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編輯：《文廟從祀位次考》（山東：山東友誼書社），頁1194。

²⁷ 《文廟祀典考》，卷1，頁29。

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宋紹興二十二年生，嘉定十四年卒。年七十，謚文肅。世稱勉齋先生。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谿人。宋紹興二十三年生，嘉定十年卒，年六十五，世稱北溪先生。清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以上諸儒坐次「皆按生年先後，合東西總計之，若有增次則移位」²⁸，所謂「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²⁹。朱熹標舉道統，隱然有道統高於治統之意，形塑儒學內涵，正如黃榦有言：「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興。」³⁰。然而，實際上卻是道統因治統得以維繫，其中或牽扯儒生利益，或可視為文化霸權。此外，十二哲、先賢、先儒的差別，以此觀之，階層在道統上有其意義。

三、歷時性：從祀時代

儒家所倡導之人倫典範為治化之本，君主需借蒞臨孔門以增輝聖德，強化政權之義理根基，達到政教合一的統治手段，顯示崇儒重道。孔廟為道統的制度化，且由上而下推動著。從祀象徵道統之賡續，人選由儒臣廷議，亟求匯聚共識，但最終由皇帝裁決。明代沈鯉曾直指廷議功能：「從祀一事，持久不定，必煩廷議者，則以在廷之臣可以盡天下之公議，而眾言僉同，人品自定，所以要之於歸一之論也。」³¹可見過程審慎漫長。又，如朱鴻林〈儒者從祀孔廟的學術與政治問題〉³²一文所言，在探討「儒者身份的升降」與「從祀的標準與時代學風的關係」時，提出「我們從從祀哪一類的儒者的事情之中，就可以發現某一個時代的儒學的解釋和期待是怎麼樣的，當時所強調的是儒學的哪些方面等等」³³，今依從祀時間臚列於下，期能從中看出學術歸趨：

（一）宋代

孔廟是結合道統與政統之處所，道統由此制度化、政治化。道統一詞，始見

²⁸ 〔清〕陳錦，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編輯：《文廟從祀位次考》（山東：山東友誼書社），頁10。

²⁹ 王懋竑：《宋朱子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卷4，頁235。

³⁰ 王懋竑：《宋朱子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卷115，頁240。

³¹ 孫承澤：《天府廣記》（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年），卷9，頁88-89。

³² 朱鴻林：〈儒者從祀孔廟的學術與政治問題〉，收於清華大學歷史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合編：《清華歷史講堂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336-355。

³³ 朱鴻林：〈儒者從祀孔廟的學術與政治問題〉，收於清華大學歷史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合編：《清華歷史講堂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337。

於朱門學者李元綱編纂的〈聖門事業圖〉，以圖表顯示道之傳承，始自堯舜，終及二程。³⁴至元代初葉，又有趙復製作「傳道圖」與「師友圖」。³⁵「師友圖」將朱門弟子視為同一門派或團體，此與「學承」體裁有理論上的關聯。因為需先產生門派或學派概念，學譜式的著作方為可能。但其概念可溯及韓愈〈原道〉，北宋石介、南宋胡宏與朱熹都闡發此一概念，漸形成宋儒的集體意識，是時重視文教，儒學倍受重視。

1、淳祐元年（1241）：朱熹、周敦頤、二程

宋淳祐元年（1241）伊洛之學榮登孔廷，士習丕變，理宗下令學官將北宋四子及朱熹列諸從祀，以表崇獎，製〈道統十三贊〉：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裡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等書，本末洞微，孔子道，益以大明於世。³⁶

其中，朱熹於理宗寶慶三年（1227）受封為「信國公」，紹定三年（1230）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1241）則周敦頤為「汝南伯」、張載為「郟伯」、程顥為「河南伯」、程頤為「伊陽伯」。³⁷由此可見朱熹地位高於其他四子，其道統觀於《近思錄》中得以體現：

自唐虞、堯、舜、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於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迨於宋朝，人文再闢，則周子唱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³⁸

文中序列與孔廟從祀不謀而合。然而，朱熹等人從祀孔廟雖可視為朝廷與道學家關係一大轉折點，這是否意味君主對道學家的全然接受？據《宋史·理宗本紀》所載，「雖然，宋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視前朝奸黨之碑，偽學之禁，豈不大有逕庭也哉！」但是，即便有宋理宗提倡科舉、獎勵學術，使道統得以復存，卻仍因不理朝政而終致亡國，誠如狄百瑞所言：「宋室將朱學訂為科舉取士的標準，似屬確立朱學正統地位的必要措施。但此類促使朱學制度化的辦法，在

³⁴ 李元綱：《聖門事業圖》，收於《百川學海》，頁999-1001。

³⁵ 《元史》卷189，頁4314。

³⁶ 脫脫：《宋史》，卷42，頁821。

³⁷ 李心傳：《道命錄》（叢書集成初編），卷10，頁116-117。

³⁸ 朱熹：《近思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14，頁327。

朝廷日益衰落的情況下，不過虛有其表，徒具形式，對朱學本身毫無裨益。」³⁹

2、景定二年（1261）：張栻

景定二年（1261）春正月丁丑皇太子詔以張栻從祀，同時從祀者尚有呂祖謙。

3、咸淳三年（1267）：邵雍

度宗咸淳三年（1267），子思、曾子同時配享宣聖，四配方告底定。⁴⁰邵雍亦於該年從祀，或與朱熹受朝廷重視有關，詔書有言：

朱熹所贊已祀其四，而尚遺雍、光，非缺典與？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⁴¹

朱熹曾有〈六先生畫像贊〉列出周敦頤、二程、邵雍、司馬光、張載六人，指出諸儒「學雖殊轍，道則同歸」⁴²，並稱邵雍：「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裡乾坤。」⁴³是故，胡安國在請加封邵雍、二程、張載的奏狀中曾伏望陛下對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盛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乃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明代以後，邵雍《皇極經世》被編入《性理大全》，成為科舉取士必讀經典。黃畿讚譽：「邵子之學，其仲尼之學乎！仲尼之道，其伏羲之道乎！」⁴⁴極力肯定其人對易學及儒學之貢獻，類似言論亦見於《宋史·道學傳》，謂雍研易「探蹟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充分肯定邵雍易學成就。

（二）元代

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開始實行科舉考試，明經選用朱熹之註，中選進士需擇日至孔廟行釋菜禮，並刻石題名於國子監。同年，以宋儒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元儒許衡從祀。⁴⁵其中，元儒許衡因

³⁹ 狄百瑞：〈元代新儒家正統思想的興起〉，《思與言》第21卷第1期，1983年，頁43。

⁴⁰ 唐時，曾參因著《孝經》，故比擬十哲，旋即中輟；徽宗崇寧元年（1102），朝廷特追封子思為沂水侯，大觀二年（1108）則入祀孔廷，端平二年（1235）復詔升為十哲。咸淳三年（1267），兩人方躋身四配，正如朱熹所言：「配享只當論傳道，合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相關資料見《宋史》卷46，頁897、卷105，頁2550；《朱子語類》卷90，頁2294。

⁴¹ 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14，頁16。

⁴²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6，頁12。

⁴³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5。

⁴⁴ 《經義考》卷271。

⁴⁵ 宋濂：《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24，頁557。

傳播朱學為新近添入，其餘諸儒則於南宋咸已從祀，主因為元一統天下，為消弭南宋和北方政權祀典之異，故有此命。由此觀之，朱學宰制元代學術，從祀者與官學關係密切。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1362）從祀五賢⁴⁶，其中，楊時「親得程門道統之傳，排王氏經義之繆」⁴⁷、李侗「傳河洛之學，以授朱熹」⁴⁸。但後因元亡，加以當時孔廟制度混亂，是故，明代重予祀命。

（三）明代

明世宗時大學士張璁有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⁴⁹反對身為人臣的孔子死而封王的做法，此說法深契世宗旨意。明世宗於嘉靖九年（1530）褫奪孔子王號，下詔改稱先師，此外，從祀弟子遭削爵稱，並毀塑像用木主，以達到壓制士人集團的實質目的。然而，「一時縉紳耳目之濡染既久，紛紛執議，幾干聚訟」⁵⁰，甚至朝臣黎貫等人認為「取譏當時，貽笑後世」⁵¹，當時孔廟改制被視為儒者之恥，稱世宗「改王稱師，毀像用主，儒者至今飲恨」⁵²，沉痛之情溢於言表。⁵³職是之故，明代雖不如宋代崇儒重道，但仍有從祀之舉。另則，明代山西提刑郭子章⁵⁴撰有《聖門人物志》⁵⁵十二卷，由於當時山西巡撫魏允貞以孔門從祀先賢先儒，諸生往往有不悉其姓名、履歷、行實者，又，《史記》諸書記孔門弟子多有牴牾，且甚簡略，故基於孟子「友天下之善士」、「尚論古之人」之意，而有該書之編輯。卷七至十為先儒，收錄有功儒學者十六人，對配享諸儒生平事蹟搜羅較備。此外，尚有明儒呂元善所著《聖門志》⁵⁶六卷，卷二為從祀列傳，錄歷代先儒、孔廟改祀、魁名內閣等，《四庫全書總目》

⁴⁶ 包括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沈、真德秀。

⁴⁷ 宋濂：《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77，頁1921。

⁴⁸ 宋濂：《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77，頁1921。

⁴⁹ 張璁：《諭對錄》，卷22，頁3。

⁵⁰ 徐學謨：《世廟識餘錄》（臺北：國風出版社，1965年），卷6，頁19。

⁵¹ 黎貫：〈論孔子祀典疏〉，《廣東文徵》（香港：珠海學院，1973），卷6，頁209。

⁵²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1，頁812。

⁵³ 相關資料參考《明史》卷50，頁1289-1299；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361-362；焦竑：《玉堂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92-93；黃進興：〈道統與治統之間：從明嘉靖九年（1530）孔廟改制論皇權與祭祀禮儀〉，《優入聖域》（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頁126-163；黃進興：〈「聖賢」與「聖徒」：儒教從祀制與基督教封聖制的比較〉、〈毀像與聖師祭〉，分別收於氏著：《聖賢與聖徒》（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頁89-180、頁229-242。

⁵⁴ 郭子章，字相奎，號青螺，自號蟻衣生，別號默逸拙者，明江西泰和人。隆慶五年（1571）中進士，任浙江湖州知府。升浙江左參政，遷都御史。著有《易解》14卷、《豫章書》122卷、《黔中平播始末》3卷等書。

⁵⁵ 〔明〕郭子章：《聖門人物志》（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

⁵⁶ 〔明〕呂元善：《聖門志》（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56年）。

列入史部存目。⁵⁷

1、弘治八年（1495）：楊時

《文廟從祀位次考》⁵⁸指楊時於明弘治九年從祀，封將樂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楊時親得程門道統之傳，又曾力辨王安石新學經義之謬，批判異端，非有傳經之功，而是以明道之儒身份得以從祀。關於楊時從祀時間，洪國強的〈宋儒楊時在明代從祀孔廟的歷程及其時代意義〉⁵⁹一文中清楚梳理：文中從地方請祀和朝廷議祀孔廟人選的互動角度，重建楊時在明代從祀的歷程，藉此說明地方社會現實需求和道統敘事文本變動對朝廷孔廟議案的影響。《明英宗實錄》卷 163 中記載屢次因無影響巨大的釋經專著而被拒入祀的楊時，在明代從祀歷程有三次，分別是正統十三年（1448）、成化元年（1465）、弘治八年（1495）。其中，第二次為楊時從祀孔廟的轉折點，當時蕭山縣民為保證當地水利設施的維修經費，積極推動湘湖附近「楊長官祠」祀主楊時從祀孔廟，而使從祀案獲得重要進展。此則將孔廟從祀與地方社會現實訴求聯繫起來，將研究視野從政治學術擴展到經濟、社會。

2、萬曆四十一年（1613）：羅從彥、李侗

據《文廟祀典考》⁶⁰記載，明萬曆四十一年，提學僉事熊尚文請祀羅從彥、李侗。禮部覆准，將二賢列宋儒楊時之下，入廟從祀。《闕里文獻考》⁶¹則繫之四十七年，謂福建巡撫丁繼宗所請。

明中葉後，德性漸獲重視。時儒瞿九思倡議：「凡諸儒之學，所以學為聖賢，必其學已得正傳，可以受承道德，方可列於孔廟，以為聖人之徒。」⁶²可見從祀要件重生命實踐，德行優於經術。

（四）清代

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下詔朱熹既為孔孟正傳，宣躋孔廟四配之次，

⁵⁷ 《四庫全書總目》云：「然如魁名內閣，無關道統，而詳悉臚列，別次於從祀諸儒之末，殊為不倫。又以諸儒未入祀典者，別載擬祀三十五人。中如岳飛之精忠，不在乎闡明理學，錢唐之直踐，亦未聞其詮釋聖經，乃欲例諸歷代儒林，擬議亦為失當。」是書編纂體例不無可議，但羅列資料旁搜博採，對研究配享祭祀制度仍有助益。

⁵⁸ 〔清〕陳錦，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編輯：《文廟從祀位次考》（山東：山東友誼書社），頁 1194。

⁵⁹ 洪國強：〈宋儒楊時在明代從祀孔廟的歷程及其時代意義〉，《新史學》第 25 卷第 1 期，2014 年 3 月，頁 51-95。

⁶⁰ 龐鍾璐：《文廟祀典考》（中國禮樂學會，1977 年），卷 4，頁 17。

⁶¹ 〔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臺北：鐘鼎文化出版公司，民 56 年）。

⁶² 〔明〕瞿九思：《孔廟禮樂考》，明萬曆年，卷 5，頁 53。

後因李光地勸阻才使之退居十哲之末。⁶³清初程朱學者的鼓吹和君王的支持，使朱子凌駕漢唐以下諸儒，直承孔門正學，也代表程朱理學的勝利及官學地位的肯定。而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揭示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聖祖仁皇帝御定的《御纂性理精義十二卷》成書之由時，肯定朱門高弟陳淳之啟發：「初，朱子門人陳淳撰《性理字義》，熊剛大又撰《性理群書》。性理之名由是而起。」另則，康熙二十四年（1685）進士張伯行曾將陳淳與黃榦、蔡元定、劉燦諸人並列：

昔孔子之徒三千，而斯道賴以昭著。朱子門下知名之士，如黃、陳、蔡、劉輩，亦不下數十餘人。⁶⁴

又如康熙三十四年（1695）時，施元勛將《北溪字義》視為周、二程、張、朱五子思想的完整表達，「經書中之要義，如身心性命之端，理義道德之旨，與夫陰陽鬼神之微渺、儒術異流之同異，綱舉目張、條分縷析、遍布周密、發揮無遺。」而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時，戴嘉禧、顧仲等人亦刊刻《北溪字義》，由此，皆營造一定的學術氛圍，亦為雍正時的從祀起了先導作用。

1、雍正二年（1724）：張載、黃榦、陳淳、尹焞

身為異族統治者的雍正（1678-1734）確實了解孔教對社會的凝聚力，對其重要性深有所悉，因而增祀程朱學者，宣示教化之盛，在宣諭禮部時可看出清初君主擴張孔廟之意義：

若無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敘之經，昧於民彝物則之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長，以賤妨貴，尊卑倒置上下無等，干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勝言哉？惟有孔子之教，歷世愈久，其道彌彰，統智愚賢不肖之儔，無有能越其範圍者。綱維既立，而人無踰閑蕩檢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運〉曰：「禮達而分定。」使非孔子立教垂訓，則上下何以辨？禮制何以達？此孔子所以治萬世之天下，而為生民以來所未有也。使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極於上而表正萬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亦知倫紀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風俗既端，而受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見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⁶⁵

雍正的〈上諭〉點出孔子之教能「統智愚賢不肖之儔」，並加以「人無踰閑蕩檢之事」，故「在君上尤受益」，由此可知道統為治統所繫，適顯現兩者之間的互倚

⁶³ 李清植：《文貞公年譜》（臺北：廣文書局，1671年），頁50。

⁶⁴ 《正誼堂文集·續集》，卷12。

⁶⁵ 龐鍾璐：《文廟祀典考》（中國禮樂學會，1977年），卷1，頁12。

關係，於是將政治勢力延伸至文化思想，也反映人君提倡孔廟之底蘊⁶⁶。此外，雍正亦表明「孔子之道，垂範古今，朕願學之志，時切於懷。」⁶⁷。

雍正元年（1723），雍正皇帝封孔子五世祖以下依次為肇聖王、裕聖王、昌聖王、啟聖王，於原家廟處改建崇聖祠以祀之，後移建家廟於原神廚處，另在後院建神廚、神庖。⁶⁸根據《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所載，雍正二年（1724）三月，雍正帝詣太學謁先師孔子，行禮畢，滿漢祭酒、司業講《大學》、《書經》。宣制曰：「聖人之道，如日中天，講究服膺，用資治理。爾師生其勉之。」先是，二月十七日，曾諭：為尊師重道，一應章奏、記注，將皇帝幸學改稱詣學，以伸崇敬。本日，以皇帝親詣太學，釋奠先師孔子，於彝倫堂講經論學。典禮完成，命九卿等議應入崇聖祠祔享之先賢，先賢、先儒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增各省之府州縣學取中額數。鄉試中額，酌議增加。

五月時，「禮部等衙門遵旨議奏，古昔聖王制祀，凡有道有德，施教於學者，祀於瞽宗。漢文翁立學宮於成都，首祀孔子，又畫七十二子之像於壁，此諸賢從祀之始也，厥後有功經傳皆得從祀，謂之經師。自唐至明，歷代進退不一，而當代賢儒得預於祀典，蓋自宋始。」⁶⁹是時，禮部詳考先儒事實，請增入兩廡從祀者十八人⁷⁰，然雍正帝對此採審慎態度，直指「文廟關係學術人心，典至重也」⁷¹，因此，復祀或從祀應詳加考證，折衷盡善，方能使「萬世遵守，永無異議」⁷²。八月，孔廟遭雷擊，大成門以北主要建物幾乎被毀，雍正帝引過自責⁷³，「降旨遣大臣前往」⁷⁴，並期許士子「飲水思源，不忘所自，如有情願捐貲，不必限以數目」⁷⁵，詔示重修孔廟，派署工部侍郎會同山東巡撫陳世倌等主持監修，諭旨：凡殿廡制度規模，以至祭器儀物，都要繪圖呈覽、親為指授。是時，禮部等衙門

⁶⁶ 相關資料見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87年），頁105-132。

⁶⁷ 孔繼汾：〈（世宗）御製重修闕里孔子廟碑〉，《闕里文獻考》，卷32，頁2。

⁶⁸ 相關資料可參考曲英杰：《孔廟史話》（臺北：國家出版社，2004年），頁61。

⁶⁹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一），臺灣華文書局發行，卷20，頁18。

⁷⁰ 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陸贄、韓琦、尹焞、黃榦、陳淳、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陳澹、羅欽順、蔡清、陸隴其。

⁷¹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一），臺灣華文書局發行，卷20，頁20。

⁷² 雍正認為「唐之陸贄、宋之韓琦，勳業昭垂史冊，自是千古名臣，然於孔孟心傳，果有授受，而能表彰羽翼乎？其他諸儒是否允協？」見《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一），臺灣華文書局發行，卷20，頁20。實則，一個社會道德如以聖賢為重心，則外在社會體制的公道性常常受到忽略，故以豪傑為入德之門絕非自棄於聖賢之堂。見蔣年豐：《海洋儒學與法政主體》（臺北：桂冠出版社，2005年），頁248。

⁷³ 「朕惟孔子道德高厚，為萬世師表，所以維世教、立人極者，與天地同其悠久。朕臨御以來，思極尊崇之典，用申仰止之忱。今闕里聖廟被焚，豈朕尊師重道之心誠有未至歟！」（《孔府檔案》，卷4991。）

⁷⁴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一），臺灣華文書局發行，卷23，頁23。

⁷⁵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一），臺灣華文書局發行，卷23，頁24。

再議從祀，重新定明嘉靖年間被罷祀者，從祀孔廟宜復祀者，有顏回等六人，宜增祀者，有萬章等二十人。入崇聖祠者一人：張迪。宜增置博士者：冉雍、冉伯牛、子張、有若等四人。⁷⁶除了復祀者六人⁷⁷外，尚有增祀者尹焞、黃榦、陳淳等二十人⁷⁸，「或親承訓論、遞衍源流，或遠契心傳，倡明正學，升諸從祀之列」⁷⁹。雍正帝對此建議頗為贊同，表明「孔子道高德厚，萬世奉為師表，其祔享廟庭諸賢，皆有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而賢儒代不乏人，或有先罷而今宜復，有舊缺而今宜增，其從祀崇聖祠諸賢周程朱蔡外，孰應升堂祔享者，竝先賢先儒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以昭崇報，均關大典、九卿、翰林、國子監、詹事、科道，會同詳考定議以聞。」⁸⁰，並言：「朕念先賢先儒，扶持名教、羽翼聖經，有關學術人心，爰命九卿詳議。今諸臣參考周詳，評論公正，甚合朕心，著依議行。」⁸¹對此，乾隆曾為乃父繼聖祖感發，致文治茂隆有言：

聖學高深，探性命之精，操治平之要，天德王道一以貫之。隆禮先師增祀先儒，右文重道之典，超越常制。⁸²

此次入祀孔廟的儒者，除了「先罷而宜復」者外，尚有「舊缺而增祀」者，人數僅次於唐太宗和唐玄宗的時代，程朱學者居十三位，卻無一位為陸王學者⁸³，可見從祀人選與思想脈動息息相關，而受理學思潮氛圍影響。從祀標準除了闡明聖學的經師外，傳授道統的人師更為重要。如乾隆年間《龍溪縣志》⁸⁴卷之四「學校」有云：「龍之學建於宋而理學亦盛於宋。北溪東湖諸君子接踵而興，或先聖先師之靈爽，實式憑之，故潛孚默感，若是其神耶？」⁸⁵適見陳淳諸人貢獻。

2、道光二十九年（1849）：謝良佐

謝良佐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關於謝良佐在洛學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從南宋開始，就有不同的認識。朱熹一方面肯定謝良佐的作用，但又認為他「別立一家」；而於道光二十九年從祀一事，可見當時學者認為

⁷⁶ 史松主編：《清史編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64。

⁷⁷ 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甯。

⁷⁸ 除文中三人外，尚有縣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魏了翁、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澧、羅欽順、蔡清、陸隴其。

⁷⁹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一），臺灣華文書局發行，卷23，頁24-25。

⁸⁰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一），臺灣華文書局發行，卷17，頁2。

⁸¹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一），臺灣華文書局發行，卷23，頁25。

⁸² 清高宗：《御製文初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9，頁9。

⁸³ 龐鍾璐：《文廟祀典考》（中國禮樂學會，1977年），卷1，頁9-10；卷2，頁11-13。

⁸⁴ 〔清〕吳宜燮修，黃惠、李疇纂：《龍溪縣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據清乾隆27年（1762）刻本影印。

⁸⁵ 〔清〕吳宜燮修，黃惠、李疇纂：《龍溪縣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據清乾隆27年（1762）刻本影印，頁1。

謝良佐繼承和發揚了洛學的傳統。

3、光緒十八年（1892）：游酢

游酢曾受程顥召任河南扶溝教諭，為道南儒宗，朱熹讚其「道南首豸山學共龜山同立雪，理窟從洛水本歸濂水引導源」⁸⁶，開創閩學先河，載道南歸，並帶領楊時拜師二程，進而影響閩北的胡安國、羅從彥等學子紛至洛陽拜師伊川，促使文化重心南移再興。官雖不顯貴，卻能針砭時弊，輒樹惠政，有救世濟眾之志，後人有詩稱其「夜雪侍嚴師，春風遣善政」⁸⁷，強調人君為政應惠澤於民：「膏澤下於民，則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內省不疚矣。此天下所以心悅而誠服也。天下心悅而誠服，則親之若父母，仰之若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可不謂光明矣？」⁸⁸因此，君王恩澤於民，政治方能光大盛明。游酢曾言：「道者，天也，故言志；德者，地也，故言據；仁者，人也，故言依。至於游於藝則所以閑邪也。蓋士志於道，苟未至於縱心，則必有息游之學焉」⁸⁹他解釋《論語·述而》文句，認為研習六藝乃是為了防止邪心，為操存本心的方法。

游酢為學推崇《周易》，除了義理發揮外，亦對時人解釋進行辯說，且為朱熹取入《集注》等書中：「《易》之為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之理而已」⁹⁰，以《周易》、《中庸》為重點。其人雖為程門四先生之一，經學思想亦有承先啟後的作用，然從祀時間卻最晚，在《宋史》中的份量也與齊名的楊時所差甚多。據《清實錄光緒朝實錄》記載，清光緒十八年（1892），上諭內閣禮部等衙門奏議復福建學政沈源深奏請游酢從祀孔廟：

宋儒游酢，清德重望，在當時已與程、朱諸賢為人心所共推重，所著《論語雜解》、《中庸義》、《孟子雜解》、《周易毛評》、《詩二南義》等書，足以闡明絕學，羽翼經傳，其生平出處、史傳昭垂，允為躬行實踐，宜膺茂典，俾列宮牆，游酢著從祀文廟，位在西廡楊時之次，以崇實學而闡幽光。

沈源深為晚清理學家倭仁（1804-1871）門人，以化民成俗為己任，受其師影響頗深。《清儒學案》稱倭仁為「道光以來一儒宗」，推廣理學不遺餘力，並透過門人振興道學思想，也使游酢地位獲得肯定。

⁸⁶ 朱熹：《朱子文集》，頁 344。

⁸⁷ 〈皎如亭憶游定夫先生〉，《游酢文集》卷 8，頁 262。

⁸⁸ 〈易說·彖曰履柔履剛也至光明也〉，《游酢文集》卷 2，頁 36。

⁸⁹ 〈論語雜解·志於道章〉，《游酢文集》卷 3，頁 104。

⁹⁰ 〈孫莘老易傳序〉，《游酢文集》卷 6，頁 171。

四、結論

朱子〈答陳同甫〉：「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這番用語強烈的話，突顯從孔子以來，儒家思想絕非僅為客觀知識的學習，尚待實踐，方能落實「道」的理想性。《宋史》別立〈道學傳〉，說明士人不必追求仕祿，或是著力文學經術，自有承繼道統的不朽價值，其中人物從祀孔廟者約佔百分之九，或許因道學家們能為厲世摩鈍之用，更具慨然承擔的氣魄。因此，透過官方力量操作，得以從祀孔廟，此一殊榮也代表後世學者及統治者在儀式及制度上對他們延續道統貢獻之承認。以從祀時代觀之，主要集中在「學統四起」⁹¹的宋代與雖是外來政權，但卻崇尚文治的清代，朝廷宣揚孔廟禮儀，使政治與學術力量得以匯合，也可看出從祀首重在實踐孔道之功，但在不同時代仍有其偏重；另以從祀人物來看，「道學一」中佔六分之五；「道學二」佔十分之六；「道學三」中人物均從祀孔廟；「道學四」則佔六分之二。其中，「道學一」人物主要為北宋五子；「道學三」人物為朱熹、張栻；「道學二」則主要為洛學人物；「道學四」則為朱子門人。以此觀之，北宋五子及朱子的地位確實高於其他道學家，從祀制也使聖學系譜得以建構，從祀標準在於對儒道有功。

張曉生在〈近二十年海峽兩岸「孔廟研究」文獻之回顧與反思〉⁹²一文中，以臺灣「國家圖書館中文聯合書目」、「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大陸的「中國國家圖書館中文數位書目」、「中國期刊網」為基礎，羅列近二十年（1994-2014）此一階段出版品，比較得失，並提及若要對孔廟文化的內涵進行全面的梳理和掌握，則必須將皇帝詔令、學者文集、金石碑刻及方志資料等散見在各種歷史文獻中的資料尋索出來，並進行分析。基此，或待日後有更充裕的時間，搜尋更完善的資料，方有進一步的研究結果。

⁹¹ 全祖望：〈宋元儒學案序錄〉，《宋元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年），頁2。

⁹² 張曉生：〈近二十年海峽兩岸「孔廟研究」文獻之回顧與反思〉，《國文天地》第30卷第10期，2015年3月，頁57-60。

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 〔宋〕歐陽脩：《新唐書·禮樂制第五》，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宋〕朱熹：《近思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
- 〔明〕宋濂：《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明〕瞿九思：《孔廟禮樂考》，明萬曆年。
- 〔清〕《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清〕陳錦，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編輯：《文廟從祀位次考》，山東：山東友誼書社，頁1196。
- 〔清〕錢大昕：《潛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清〕《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一），臺灣華文書局發行。
- 〔清〕清高宗：《御製文初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龐鍾璐：《文廟祀典考》，中國禮樂學會，1977年。
- 〔清〕吳宜燮修，黃惠、李疇纂：《龍溪縣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據清乾隆27年（1762）刻本影印。
- 〔清〕全祖望：〈宋元儒學案序錄〉，《宋元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年。
- 〔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臺北：鐘鼎文化出版公司，民56年。

二、近人論著

- 孔祥林等：《世界孔子廟研究》（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
- 曲英杰：《孔廟史話》，臺北：國家出版社，2004年。
- 狄百瑞：〈元代新儒家正統思想的興起〉，《思與言》第21卷第1期，1983年，頁43。
- 朱鴻林：〈儒者從祀孔廟的學術與政治問題〉，收於清華大學歷史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合編：《清華歷史講堂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 洪國強：〈宋儒楊時在明代從祀孔廟的歷程及其時代意義〉，《新史學》第25卷第1期，2014年3月，頁51-95。
- 張曉生：〈近二十年海峽兩岸「孔廟研究」文獻之回顧與反思〉，《國文天地》第

30 卷第 10 期，2015 年 3 月，頁 57-60。

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87 年，頁 105-132。

黃進興：《優入聖域》，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蔣年豐：《海洋儒學與法政主體》，臺北：桂冠出版社，2005 年。

韓秀林編：《孔府孔廟孔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年。

On *Book of Song* Daoxue character 's elevation to the confucian temple

Li, Hui-ru*

Abstract

"Book of Song" has Daoxue chapter, indicating that the scholar does not have to pursue Shi Lu, or focus on literature through art, its own orthodoxy inherited enduring value, in which characters from the worship of Confucius were about nine percent, perhaps because of Taoism Li Shi family were able to use the blunt friction, more generously bear spirit. Thus, through the official power to operate, to the worship of Confucius Temple, this award also represents a later scholars and rulers in the ceremony and institutional continuity of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recognition of Orthodoxy. View from era to worship, mainly in school systems everywhere Song and although foreign regime, but rul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court etiquette Confucius preached that political and academic forces to converge, although can also be seen from worship Zonta reported success principle, but still has its emphasis at different times; the other characters in the worship, the Northern Song Wuzi and Zhu Xi's position is indeed higher than other moralists, from worship system also makes St. learn to construct pedigree.

Keywords: Daoxue chapter, Zhu Xi, to the confucian temple

* Assistant Professor, Tamkang University Dept.of Chinese Literature.